

尘世之路与“天国之路”

——浅析伊·谢·什梅廖夫的宗教小说《天国之路》

戴卓萌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什梅廖夫(1873—1950)是俄罗斯第一次移民浪潮中最优秀的作家之一,1931年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天国之路》是什梅廖夫的一部遗作,作家称之为“宗教小说的试作”。故事叙述的是男女主人公如何在通往天国的道路上追求精神的完善与升华。作家创作的独特性构成了其特有的艺术创作方法——宗教现实主义。宗教现实主义体现了艺术作品中大地与天空不可分割的联系,是作家对绝对精神的追求和对尘世生活、对信教者的宗教探索,对祖国历史命运的关注,反映了耶稣基督在尘世现实的存在。该小说是作家探索精神再生之路的尝试。

关键词: 宗教小说; 宗教现实主义; 偶然性; 行传体裁; 永恒女性

中图分类号: H106.99

文献标识码: A

20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伊·谢·什梅廖夫(1873—1950)的创作以其广阔的主题和多样的体裁构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完整的世界。在这个艺术世界中,有作家奇崛的创作诗学理念、别具一格的形象体系、独具匠心的形象塑造手段和结构原则。在什梅廖夫的作品中,关于生活的美学观念来自于日常生活和存在的统一,来自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交汇。什梅廖夫的大部分作品浸透着浓郁的基督教精神。作家(Памяти И.Шмелёва 1956: 332)本人不止一次地指出:“真正的艺术无不具有深刻的宗教理念”,并认为自己的任务在于“使艺术具有神性”、创立“一种新的美学观”。在作家的创作(《苍天之下》、《来自饭店的人》、《病疾》、《旋转的木马》、《隐秘的圣容》、《没有上帝你不能活》、《上帝的夏天》、《基督复活》)中,不乏基督教的形象和主题,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也多染上了浓郁的宗教色彩。在中篇小说《朝圣者》(1931—1932)中,作家通过对朝圣者的心理的探究,通过对灵魂拯救之路的描写,对俄罗斯的发展过程以及个人的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思考。长篇小说《来自莫斯科的保姆》、《上帝的夏天》集中体现了俄罗斯普通宗教信仰者的形象。

在什梅廖夫的艺术世界里,有两大因素相互关联并决定着个人的命运,这就是“上苍”和“大地”。在作家的笔下,对大地刻骨的爱与对天国执著的追求常常密切相连。在作者所描写的民间日常生活中,每每迸发出具有崇高的精神价值的火花。在什梅廖夫的小说中,这种日常生活的场景俯拾皆是。在此基础上,作家描绘出俄罗斯几代人的广阔的生活全景,同时也确立了关于人民创造了无限的生活以及基督教精神在人民中代代相袭的历史主义宗教观。在作家的创作中,长篇小说《天国之路》(1935—1947)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是作家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的艺术遗作。小说的第一部于1936年完成,第二部创作于1944—1947年。

如什梅廖夫的所有作品一样,长篇小说《天国之路》有其坚实的现实基础。小说叙述了

机械工程师韦坚加梅尔和他的不合法的妻子达丽娅·科洛列娃是如何走在通往上帝的艰辛之路上的。书中的主要人物并非虚构，而是确有其人，甚至连姓名都未曾改动。维克托·阿列克塞耶维奇·韦坚加梅尔（1844—1916）是作家妻子奥·阿·什梅廖娃的亲舅舅。由于妻子另有所爱，30岁的工程师离家而去。后来，他偶遇在莫斯科斯特拉斯修道院做杂役的年轻的女子达丽娅·科洛列娃。她是一个孤儿，在床单厂当过绣金女工，后与韦坚加梅尔未婚同居（男主人公的第一个妻子没与他离异）。一次，当他们拜访奥普金修道院时，阿姆洛西长老预言达·科洛列娃将不久于人世。后来发生的事情正如长老不幸而言中的那样，在陪同丈夫前往哈萨克斯坦的土耳其斯坦修建铁路的途中，科洛列娃在车站跑去买东西的路上被迎面开来的火车压断双腿，并死在了去医院的路上。达丽娅死后，韦坚加梅尔曾想要了断余生，但后来他还是听从了奥普金修道院约瑟夫长老的建议，于1900年当上了奥普金修道院的杂役，并在那里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程。在修道院里，他显示出了一个设计师的全部天才。在他的指导下，建成了韦坚斯基修道院的主要部分和列夫·卡当斯基教堂。

什梅廖夫在谈起这部小说时，把它作为一部宗教小说的试作。（Памяти И.Шмелёва 1956:27）作家十分清楚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有机地将古典小说的体裁同宗教文学的体裁结合起来。他对此写道：“不管有无重大意义，俄罗斯小说在我们知道的范围里都与信仰有关。”尽管许多俄罗斯著名作家都表示过要创作一部在宗教方面论据充分的小说，“然而谁也没把它创作出来……也许我也写不出来……”（Дакварт-Баркер1954: 167—168）在创作《天国之路》时，什梅廖夫为自己确立了两项任务：一是再现一位没有信仰的知识分子获得信仰的过程，二是塑造一位有深刻信仰的女主人公的形象。俄罗斯古典作家已详尽研究了生存的意义和最深刻的道德冲突。但没有一本书像什梅廖夫那样，将小说建立在一贯的东正教世界观之上，并且在这种世界观中小说的情节占有中心的位置。因此，作家认为他的构思在俄罗斯文学中有新意。“在整个文学和生活中我没有找到……纯理性主义者是怎样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这里……有神赐。充满热情的纯理性主义者的态度……啊，这是怎样的任务！应该试图去解决它。”（Ильин, Шмелёв 2000a:15）什梅廖夫创作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成功地完成了其先人们——俄罗斯文学经典作家们的遗愿。

作家坚信在这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是上帝的意志一直在引导着他。什梅廖夫（Ильин, Шмелёв 2000a: 175）在1937年3月14日给伊里英的信中写道：“有时在我的心里为创作这部小说涌现了许多莫名其妙的感情……我早该动手写，但不知道为什么延宕至今。”他（Ильин, Шмелёв 2000a: 373）在1945年12月给朋友的信中这样说：“假如没有上帝的帮助，我不会写出《天国之路》。”这是一条作家力图在艺术形象和画面中探索人类通向精神再生、获得拯救的充满荆棘之路。

主人公的天国之路始于尘世。在小说的87个章节中，作家生动形象地叙述了年轻姑娘达丽娅·科洛列娃如何以自己的爱和东正教信仰的力量引导男主角走向上帝，帮助他获得精神上的再生。

存在的意义是在人类文明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困扰着人们的一个问题。对人类精神探索的几个世纪的经历追踪使我们发现，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宗教意识危机的萌芽。这种危机到19世纪后半叶达到了顶峰，并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20世纪宗教发展的独特性。以前所信奉的关于神的启示现在被彻底推翻，人们已不再求助于“神力”去洞悟、解释某些神秘的本质，而是开始凭借人固有的意识、经验和智力去认识他们所面对的客观世界。在科学领域确立了实证主义，而更希望在宇宙的中心看见崇高神性的古典哲学在变化了的新历史条件下已受到了挑战，甚至出现了危机，它们已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需要。这种19世纪末人的精神意识的危机也反映到了《天国之路》的字里行间。小说男主角韦坚加梅尔是19世纪典型的持怀疑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和天文爱好者，崇尚西欧哲学，受过上流社会良好的教育。年轻时他曾否认上帝创造世界的思想。韦坚加梅尔认为，宇

宙只是“物质力量自由的游戏”。(Шмелёв 1998a:19)¹对死后的生命问题,他的观点和屠格涅夫笔下的虚无主义者巴扎洛夫一样:“一切都是虚无缥缈……还是巴扎洛夫说得对!”他后来将自己对事物的理解方式称作是“心灵的崩塌”。他甚至把男女关系看成是“生理的选择定则”,直到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个人的生活中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内心的空虚和绝望使这位沉溺于科学的年轻人产生了关于许多科学的推测最终是水中捞月的想法。看似合理的东西在绝对不可知的、无论什么样的科学假想都无法解释的力量面前被击得粉碎。韦坚加梅尔在绝望中得出的结论是:“人的智慧无法理解不可知的东西,我们所有的公式、假设和体系对无界限的东西来说是最纯粹的无稽之谈”。(22)他为无法领悟宇宙崇高的法则而痛苦。在达琳卡的身上,他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他来说,从黑暗到光明的复明之路开始了,但这条路充满了艰险、痛苦和怀疑。在男主角的命运中无疑折射出什梅廖夫本人精神形成过程中的特征。然而,韦坚加梅尔依然是一个怀疑者、理性主义者。他对信仰的世界只是有一些皮毛的了解。在努力弄懂世界神秘的法则时,作为一名工程师,他用自己职业的概念和术语来想象世界的构造。人类命运的“规则”和“图纸”在他看来是某种超自然意志绘出来的。作家在小说的附注中说,怀疑将长时间地折磨这位人物,他应该将在晚些时候才获得信仰(故事中的情景确实是这样:男主角以一个无神论者的身份进入修道院)。

小说的情节非常简单。1875年3月的一个夜晚,男主角在生活和沉重心灵的十字路口上,偶然遇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女人,她用内心的精神之光照亮了他,并领他走向新的道路。小说中,作家运用了传统爱情小说的形式和体裁,同时充实以新的内容。借助于“恋爱故事”,作家体现出关于人的生活中一切都是天意安排的思想。随着小说中爱情情节的不断深入,男女主人公在精神上也日趋成熟,爱情获得了越来越复杂和崇高的内涵。已近中年的男主角在强烈的爱情的驱使下来到修道院。在朴实无华的修道院的日常生活中,维克多·阿列克塞耶维奇·韦坚加梅尔内心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宁静与和谐。

维克多·阿列克塞耶维奇·韦坚加梅尔和17岁的达丽娅·科洛列娃的命运结合有些突兀,但并非偶然。达丽娅是这样看待他们的相遇的:“我知道这是上帝吩咐不要离开他,他的心灵碰到了障碍,渴望神助。”作家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要在《天国之路》一书中指出,力所能及地实现福音书中的真理是无怨无悔的惟一道路。(459)作家从这一点出发,尤其突出地表现了俄罗斯文学中女性性格,他写到,俄罗斯文学塑造了“一系列意志坚强的俄罗斯妇女和姑娘的美好形象。”在俄罗斯经典作家塑造的优秀女性长廊中,什梅廖夫笔下的达丽娅也应该算是一位。作家把她描写成一个在精神上不断完善自身的形象。

达丽娅没有受过上等人的教育。她是由姨妈按照修道院的戒律教育带大的。除了宗教生活,她实际上没接触过任何其他生活方式。她从小就养成了温柔、顺从的性格,连怀疑信仰的念头都不敢有过。她熟悉祈祷文,熟读圣徒的行传,并从中获取到智慧。受难者和殉教者的痛苦在达丽娅看来就是为上帝做的最高级的事情,并值得为此作终生的准备。圣徒行传对她来说不是传说和神话,而是崇高的精神功绩的典范。她从小就知道,尘世上的一切都不会永久存在,永恒的只有灵魂。人之所以被赋予生命,是为了从善,而僧侣生活之路是最好、最能拯救人的道路。正是带着这种希望,她在第一次遇见维克多·阿列克塞耶维奇·韦坚加梅尔的那个夜晚走进了斯特拉斯修道院。也正是在这种想法的支配下,她又出人意料地回到了尘世,成为无神论者韦坚加梅尔的终身伴侣,开始生活在没有教堂祝福的婚姻中。为此对她的惩罚是重病、不育乃至死亡。小说中,作家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命运体现出“灵魂磨难的历程”的福音精神。经过道义上的堕落、苦难的重负与困苦,人在精神之路上得以净化。达丽娅经历了尘世间的诱惑与享乐,在小说中,作家尤为详细地描写了她如何面对韦坚加梅尔的朋友、风度翩翩的年轻的御前近卫官德米特里·瓦加耶夫公爵强烈的爱情的诱惑。女主人公把那些日子称作是“凶恶的情形”。那时,纯朴天真的达丽娅俨然成了一位社会名媛。她开始出入社交娱乐场——戏院、舞会,学会了握扇、抛媚眼、神秘地压低嗓音说话,浏览海

报，对着镜子梳理发型，活脱像一个风月场中老道的交际花。爱的欲望深深地控制了达丽娅，将精神上的自我完善问题放到了次要位置。有一天，瓦加耶夫和达丽娅在暴风雪中迷了路。小说中的暴风雪有疯狂的基调：“暴风雪狂怒”、“狂怒的烟雾”、“马咆哮发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帝之手始终没有离开过女主人公和她的同伴，使他们得到拯救，避免了毁灭。小说中情节是这样的：当达丽娅陷入情欲无力自拔、准备献身于瓦加耶夫时，管院子的卡尔普在关大门时无意撞到了沉重的护板上，撞得它直摇晃，这突然使达丽娅醒悟过来。根据圣书的教义，上帝总是对人充满关爱，通过所谓的偶然性事件为人指明生活的道路。作家在解释卡尔普关门时的举动时说：“卡尔普关了几百次门，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在我们生活中，这种“偶然性就是奇迹。偶然性有时获得了特殊的‘征兆’意义……是尘世之路的里程碑”。（223）女主人公对瓦加耶夫的爱可以说是精神毅力的考验，表明她同邪恶势力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达丽娅急急忙忙赶赴圣三一谢尔基修道院，向著名的长老瓦尔纳瓦忏悔，并坚持要求留在那里。但上帝为她安排的是另一种命运。瓦尔纳瓦神甫训导她说，“你想当修女……那谁来驾你的马车雪橇呢？没有你，你的胜利者怎么办呢？！”达丽娅这才知道，维克多的名字意味着胜利者。“你就受点折磨吧……继续驾你的马车雪橇。你是没有罪过的罪人，你忍一忍就会忍过来。别人说你……难道没有说我吗？你不穿教袍，却是一个修女。……这就是你命中注定的。”（248）这位有先见之明的修士在达丽娅身上看出了一种精神美。他为她明确了在尘世的义务，号召她要忍耐，走向精神的高处，隐居修道院对她来说是一种较轻的负重。在尘世中要严持戒律，这是小说的主导思想之一。达丽娅在同尘世间的诱惑和情欲的斗争中，实现了精神探索，形成了高尚的道德观。她自己克服了“魔鬼的引诱”，并竭尽全力帮助其他人克服这种引诱。她精神上的重任正在于此，这种重任感构成了女主人公内心的激情。在基督教传统中，燃烧的蜡烛是人的灵魂的象征。在一个有信仰的人的身上，精神的火焰总是明亮地燃烧着，同时用善和爱的光亮照亮那些内心火苗已经暗淡的人的灵魂。女主人公精神上的神赐的光亮慷慨地照亮了和她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心灵。达丽娅的名字就含有“战争”的意义。她用信仰、善良、爱和自我牺牲精神战胜了邪恶与罪过。在小说的第一卷中，达丽娅身上所要发生的事情的实际已由小说章节题目本身反映出来：《引诱》、《诱惑》、《理智模糊》、《堕落》、《启明》等等。达丽娅做祈祷时经常昏厥，根据作家的理解，这显示了她的崇高的精神，表明她同时生存在尘世与天国两个世界中。

达丽娅在引导别人的同时，自己也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在经受了痛苦的生活的考验、饱尝了痛苦和内心的悔过之后，小说的女主人公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与欢乐。净化的思想同样体现在韦坚加梅尔和他朋友德米特里·瓦加耶夫的命运中。瓦加耶夫公爵天生具有纯洁的灵魂和高尚的心灵。他曾经沉迷于财富、荣耀、女人和上流社会的娱乐，以不断征服女人的芳心、参加舞会、宴会为乐。只是在结识达丽娅后，他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经历了女主人公的纯洁、真诚的感情的痛苦，年轻的军官最后走完了精神净化的道路。爱情和痛苦很明显地使他的天性变得纯净、高尚。他把达丽娅拒绝他的求婚看作是上天的安排。年轻的军官奔赴前线为的是不愧于自己的一身戎装和荣誉。达丽娅祝福他一路平安。

小说第二部分的情节基本上发生在奥廖尔外省的姆岑斯克，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附近有一个修道院。在经历了在大城市的虚伪带来的精神的痛苦之后，达丽娅和维克多·阿列克塞耶维奇需要精神上的宁静。他们在这座简朴、安宁的乌尤托沃村找到了这种宁静。正是在这个俄罗斯大地舒适的角落里，小说的主人公获得了精神上的炽盛。韦坚加梅尔把乌尤托沃称为“人间的天堂”，达丽娅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有同感。（384）周围的人因为女主人温顺的天性和纯洁的心灵立刻就喜欢上了她。和她在一起变得纯洁和崇高的不仅有家仆、村民，甚至还有公认为“愚昧”、自傲、无人性的邻村地主库久莫夫。达丽娅在乌尤托沃显示出来的精神力量不仅为韦坚加梅尔的变化证实，也为库久莫夫、花匠穆霍莫尔，尤其是娜

斯坚卡身上的变化所证实。这些变化同样可以被看成是圣徒行传般的奇迹。

从根本上动摇了韦坚加梅尔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是他原先最不愿意相信的被达丽娅称之为“上帝的奇迹”的事情。这些“奇迹”几乎均与达丽娅的命运有关。韦坚加梅尔问起达丽娅的家谱后大吃一惊：这位穷姑娘的父亲是一个诚实、高贵的世袭伯爵，他在打猎时因“偶然事故”被打死，没来得及与达丽娅的母亲、一位纯朴的乡村姑娘成婚。第二件奇怪事是韦坚加梅尔夫妇前往的乌尤托沃村，竟是达丽娅父亲的亲妹妹奥尔加·尤托娃公爵夫人的世袭领地，这好像也是“偶然性”。第三件怪事是有关一个与达丽娅一生紧密相关的奇迹创造者尼古拉的事情。此人在俄罗斯广受尊敬，达丽娅从小就从姨妈那里学会向这位圣人祈祷。当达丽娅逃离色魔手掌，欲投河自尽时，有位老头阻止了她。老人长得极像奇迹创造者尼古拉。这位圣人在乌尤托沃教堂尤其受到尊崇。圣徒尼古拉本人原来就是达丽娅父亲和他妹妹那个家族中的著名人物。在经历了这种种“奇迹”之后，韦坚加梅尔已经不敢将诸如此类的与命运交舛在一起的现象称作是偶然性事件了。“生活之路的交舛点”上的和谐使他惊奇错愕，因为所有的地方都能感觉到上帝的存在。不久前还是无神论者的韦坚加梅尔得出结论，这一类事情按常规的道理是无法理解的。照顾作家晚年生活的尤·阿·库特丽娜（他妻子的外甥女）证实说，什梅廖夫在自己的小说中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展示一个“在基督形象中改变的俄罗斯人”。（473）作家基本完成了规定的任务。庆祝主人公进入乌尤托沃的乔迁之际的“流星雨”成了男人公世界观发生变化的转折点，是他精神升华的标志。这个场面与小说结尾相呼应。如果说在此之前韦坚加梅尔推翻了上天赐予他的神的启示，那么此刻他坚定地意识到，要理解存在的复杂性只能依靠信仰：“思想无法领悟无限！……需要靠信仰……！只有信仰才能领悟绝对的东西。别无其他……”（438）除了爱情故事之外，小说中还有对征兆、预言、有预见能力的梦、奇迹、表示上帝意图的事件、祈祷等的描写。这证明了《天国之路》同宗教文学，首先是使徒行传体裁有紧密的联系。这些因素成了什梅廖夫小说中最重要的思想和体裁的构成因素。敏感而富有洞察力的批评家伊里英把小说的特点与行传传统的因素联系起来：“小说缓慢地展开成‘行传’和‘说教’。”（Ильин, Шмелёв 2000a:196）作家在给的回信中说：“是的，这是一部关于使徒行传、生平的小说……”（395）小说中的某些章节的标题，例如《暗示》、《征兆》、《十字架之梦》、《显现》、《怪事》等足以说明小说的倾向性。就连小说中的艺术时间也具有行传文学的倾向。这些实际中发生的事情经过被投射到宗教的日历上，暗示出它们所代表的时间的永恒性和无限性。“这事发生在星期二的晚祷后，苦难女圣徒达吉雅娜节的一天”；“在复活周的星期六”（44）；“在主显节的早晨”（240）等等。主人公的生平经历在时间上的永恒性，是由《天国之路》的法则所确定。

如果不考虑小说的体裁特点，就不能客观、正确地评价作者题材上的独到之处。什梅廖夫在创造性地利用并反复思考俄罗斯文学中世俗和宗教的传统、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的同时，创造出自出机杼的体裁。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那个时代所盼望出现的宗教小说的体裁。《天国之路》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文学作品可以是宗教的、东正教的，而又不失其艺术魅力。可以说，什梅廖夫的遗作《天国之路》是俄罗斯经典小说史上一部新的叙事体作品。《天国之路》以及《上帝的夏日》、《朝圣者》、《来自莫斯科的保姆》等其他作品均体现了什梅廖夫艺术手法的独特的宗教现实主义。通过作品中大地与上苍不可分割的联系，作家表现出完整的东正教的世界观，对绝对精神的追求，（Черников 1995:316）对尘世中的一切、对信教者形象及其生活的宗教探索，以天国为目标，在信仰和基督教的爱的道路上寻求人的复苏。（Алексеев 1998:22-24）对祖国历史命运的浓厚的兴趣。这种现实主义反映了耶稣基督和代表天国理念的人的生活在尘世显现的存在。（Бердяев 1994:397）宗教现实主义作品的特点是从基督教的角度去思考世界、历史与人的问题，对人和外部世界、个性的灵与肉的相互关系的规律的理解在基督教人类学的基础上展开。宗教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它开拓了宗教的现实性、世界和人精神水平的现实性，它不否定具体的现实性，不与社会的、心理的、伦理的、历史方面相左，而是用对精神的现实的塑造来补充。它反映了天意的现实性、世界和

人在命运中的行为。这种方法再现的不仅有个性社会心理学、内心情感范围，还有精神生活。这种现实主义反映了人在世界上的现实性。什梅廖夫在自己的创作中把被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分成的天上和尘世的两个世界重新连结在一起。

俄罗斯文学作为文化的现象广泛地被嵌入到小说的艺术世界中。小说中的人物生活在19世纪的70、80年代，作家把书中人物放到俄罗斯文学的思想氛围中，有意识地借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普希金的情节与冲突。小说的第一卷中，有主人公们读《贵族之家》、《安娜·卡列尼娜》、《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情景。在第二卷中，小说主人公来到俄罗斯文学中心奥廖尔外省。他们领地的管家是屠格涅夫家族从前的仆人。在最后几卷中，根据构思，韦坚加梅尔应该分别在奥普金修道院同K.列奥季耶夫、在亚斯纳亚·波里亚纳同托尔斯泰、在斯巴斯基—卢托维诺夫同屠格涅夫见面。（Ильин, Шмелёв 2000a:377）俄罗斯古典文学中的情节、冲突、形象不断地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Л. М.鲍里索娃和Я. О.齐加（Л.Борисова, Я.Дзыга 2000: 47）把《天国之路》中的情节、形象结构、思想艺术同列斯科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进行细致的比较。对此О. Н.索洛金娜（О.Сорокина 2000: 282）也提出同样的看法。例如，在第二卷中有医学院学生、无神论者尤托夫，他是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罗夫的同貌人。但对什梅廖夫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研究者们提到的雷同现象还有，韦坚加梅尔——伊万·卡拉马佐夫、拉斯科尔尼科夫、拉夫列茨基；达丽娅——安娜·卡列尼娜、索尼亚·马尔美拉托娃、丽莎·卡丽基娜、阿辽沙·卡拉马佐夫。还有情节与结局方面的雷同：心灵枯死的主人公在特维尔林荫道上同不幸的姑娘相遇后，复苏的怜悯心和同情心挽救了他本人，《罪与罚》中心灵已被击溃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近卫骑兵团林荫道上竭力保护一位弱女子；里特林格尔男爵是一个恋童癖的窝主，他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斯塔夫罗金、斯维德里加依罗夫是一丘之貉，后者同样是自杀。

对往事的追忆不仅是个标志，还经常是创作争论的因素。什梅廖夫认为，俄罗斯文学没能解决展示堕落的人的变化与复活的任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失败是显而易见的，除了谎言就是谎言。索尼亚是鲜明的形象，拉斯科尔尼科夫欺骗自己，是让人厌烦的神经衰弱者……阿辽沙的天性和梅什金圣愚一样。我需要一个正常的‘中等的’俄罗斯知识分子。”（Ильин, Шмелёв 2000a: 16）

对小说《白痴》进行思考的同时，什梅廖夫把这部小说称作是杰作，同时又是不成功的小说。他不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对叶潘钦一家的宗教性为什么始终只字未提，为什么勾勒出的美轮美奂的阿格拉亚在宗教上是个空白。在达丽娅身上，什梅廖夫决定展示出“俄罗斯妇女心灵的作用……她本身就是俄罗斯。”作家力求塑造一个在精神上纯洁、有力的年轻女性的形象。“……我几乎是从无中创造出达琳卡。我在弄清、试图看清楚……确实，我不是根据文学的形象，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Ильин, Шмелёв 2000b:163-164）“……所有的东西都应该被纳入史诗般小说、宗教小说中……我知道，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列昂季耶夫、列斯科夫和果戈理都没能做到这点。”（Ильин, Шмелёв 2000a:381,479）

什梅廖夫为再现如此重要的构思在小说中建构起多层次的叙事结构，常常是几个讲故事者交替出现。第一个叙事层面是“作者”的话，这些话或者是作者从主人公那里听来后转述，或者是作者客观的叙述；第二个层面是韦坚加梅尔的直接叙述，第三个层面是引自达琳卡的日记。什梅廖夫还使用了更为复杂的结构——故事中的故事。小说中有各种人物的声音。叙事采用追溯手法与复调结构。作品另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对事件作出东正教的精神的评价。这方面的评价首先集中在达琳卡为亲人所记的日记中：“我轻慢地用圣人行传中的例子为自己的淫欲辩护。我欺骗、压抑了良心，并用上帝永不枯竭的慈善来掩盖自己。”（99）这昭示了故事内在的、潜在的实质。

修道院是小说空间和情节中最重要的部分。在修道院里韦坚加梅尔获得了关于东正教教会的真正面貌的概念。在女主人公受诱惑的紧要关头，修道院的轮廓就呈现在眼前。达丽娅为解决个人命运赶赴圣三一谢尔基修道院。她在梦中看见有人给她指点大修道院。现实中的韦坚加梅尔成了奥普金修道院的修士，作家本人也想走这一条道路。

小说女主人公达琳卡虽然离开了修道院，把自己的命运同维克多·阿列克塞耶维奇联结在一起，但在尘世中实质上依然是“不穿教袍的修女”。在东正教中修行与尘世的生活意味着同一个目的——同上帝的结合。达琳卡是文学中东正教教会人物少有的类型。什梅廖夫揭示了女主人公精神生活的最深处，对她来说信仰不是思想，而是贯穿于她整个生存的基础。在客观的艺术描写中达琳卡生性活泼，她既有罪过的意愿，也有尘世的迷恋。但重要的是，她把这些感受为“诱惑”并聚集自己所有的意志，求助于上帝与之对抗。能够意识并辨别出罪过并运用所有的手段去抵御它，这就是东正教教徒的生活。

在达琳卡的形象中最主要的是她具有深刻的宗教性。反映教徒在教会影响下的生活是俄罗斯文学中的新现象。达琳卡力求“铭记上帝”，但挥之不去的念头常常折磨着她，欲望控制不住地往外冒。在小说中我们看见了人同诱惑在内心的抗争。我们认为，俄罗斯文学中对东正教的苦行主义的实质从未有如此深刻的揭示。“她的灵魂……变成了上帝的光明与凶恶的黑暗搏斗的场所”（233）达琳卡的精神斗争是长篇小说的基本情节，女主人公经历了多次的诱惑、悲哀、堕落，也经历了精神上的胜利。小说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克服人身上的以自我为中心和自高自大的缺点，对神的意志的顺从与奉行。主人公看见了无法理喻的天意的秘密。充斥于小说中的众多的征兆、劝导、非偶然的偶然性是诚实之路的提示。

在达琳卡的身上，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永恒女性的形象，这个形象很大程度上根植于 20 世纪初俄罗斯象征主义的美学、哲学思想。韦坚加梅尔对达琳卡的感受转变成多神教的奉若神明。他的独白（对达琳卡的称呼以及后来的回忆）是对树立的偶像的祈祷和言过其实的赞扬：“她高高地在我的上方，是女王，我只及她的脚边”（256）、“我在她面前俯下身来，我被她的精神之伟大击溃，吻了她的脚。我明白她整个是纯洁的，是静谧的耀眼的光亮，是神圣的。”（254）“她的这种冷静的果敢，这双在灼热而又令人胆寒的反光中的眼睛，这种力量……”有时让他震惊得哑口无言。（315）诸如此类的感情上的夸张无异于诗人对爱恋中的女郎的感情。他如同小象征主义者，不仅把心爱的女人比作神圣的苦行者，而且还比作圣母。小说中 B.C.索洛维约夫的名字经常被提到。永恒女性的思想在小说第一卷的结尾瓦加耶夫致达琳卡的信中表露出来：“您是我的圣洁的妻子，我的永恒的、美妙的、能创造奇迹的、上天派来的天使……”在她那里，他听到了“上天的秘密”的细语声，在她身上他感受到了“爱的最理想的东西”，她在这个世界如同是在梦中，真正的她在另一个、超世界的地方，在她身上他感到他来自的那个永恒世界。“在您身上有诗的幻想、哲学家寻求的那种天上的、能预感到的伟大的光芒，这种光芒只有宗教才能感悟到……”他还谈到了圣母……（252-258）瓦加耶夫的信同象征主义的观点非常相似，对象征主义来说，他们的意中人吸引的正是降神的人物。达琳卡，一个纯朴的锈金女工，成为永恒女性的一种体现。在她的眼里物质开始变成了不可见世界的象征、影子、标志。在象征主义哲学中，现实的每一个现象被看作是影子、象征。我们知道，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在俄罗斯形成的象征主义热衷于寻求“隐秘的”实质。

我们要指出的是，什梅廖夫对永恒女性的迷恋不只是在索洛维约夫的哲学中，而且还表现在他本人对女性历来就有的虔敬的态度。他在《偶像的破灭》中写到：“俄罗斯女性既是姐妹、妻子，又是母亲，她在内心承载着伟大的力量——伟大的痛苦。在创造新生活的功勋中，她能做很多。她的心灵是深处、高处和光明的心灵。”（Шмелёв 1998b:324）什梅廖夫把自己的思考同索菲亚学说的观点溶汇在一起：“妇女应该制订出生活的计划，领导世界、修正世界！……世界是她的。世界就是她。”（Ильин, Шмелёв 2000a:516—518）

我们还要指出索洛维约夫哲学思想的另一个因素，即小说中关于所有发生的事的偶然性思想。这种偶然性看上去有基督教特征，但每一种现象的神秘的意义甚至是使命的思想已经摆脱了关于神和人的先见之明的概念。在现象中证明世界的思想是谢林和黑格尔绝对精神所固有的，后来为索洛维约夫的形而上学继承，又为什梅廖夫接受。Г. 弗洛罗夫斯基（Флоровский 1991: 314）是这样陈述索洛维约夫的这个特点：没有“足够的理由”，就什么也不会发生……既然发生了，就意味着不能不发生，即偶然性总的来说就不存在。男主人公认为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是按照“规划”发生的，这种想法与这种学说非常接近。

虽然 М. М. 杜纳耶夫在分析这部长篇小说时，把“规划”的概念等同于先见之明，在小说的艺术材料中，这些概念远不总是相符的。根据基督教的神学，上帝有先见之明，但不事先确定事件。神的意志的先见之明的干预有助于灵魂走向拯救，同时给人保留意志的自由。小说中的人物在评判作为神给予的提示的迹象时，与东正教对先见之明的理解很接近，但有时他们倾向于关于现象的天命的思想。男主人公经常把“上帝的平面图”当作示意图来说，一切都按照绘好的图纸、道路来进行。主人公认为堕落也是上帝的规划，它不可避免地把人引向苦难，而苦难迫使人寻找道路。（183）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主人公在欲望面前无能为力，而在道路本身的概念中开始映照出来的几乎就是天意的东西。杜纳耶夫（М. Дунаев 1999: 711）指出，白银时代以其准确的形象体系、内部的、非宗教的神秘主义、象征主义的美学遗产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什梅廖夫的“宗教小说”

《天国之路》可以说是俄国文学中独一无二的现象。小说中展示了人的内心的精神生活，这是一个由天意控制并同恶的力量展开“精神搏斗”的内心。小说既不能确定为哲学小说，也不能定为心理小说。在揭示主人公的命运和性格方面，有宗教文化、东正教苦行主义的世界观。伊里英对小说作出了正确的评价：“这是俄罗斯文学中第一部……有意识的、东正教小说……这是一部寻求的小说，这就是其精神力量所在。”（Ильин, Шмелёв 2000a:387）

作家于 1947 年完成了《天国之路》的第二部。第三部（可能还有第四部）的情节基本上应该发生在奥普金修道院。鉴于小说男女主人公后来生活的改变，什梅廖夫打算讲述俄罗斯修道院和东正教长老的故事，以及两者在俄国文化和人民中的宗教领导作用。作家（Ильин, Шмелёв 2000a:226）在 1945 年 12 月给伊里英的信中写道：“您想象不出我心中沸腾着什么。我打算（不知能否）在第三部里写很多!!! 还有第四部中……因为还有很多事应该做。应该为所有的幸福……为这样的俄罗斯、为这样的人民、为人民如此的宗教力量赞美上帝。”为了能更深刻地体验修道院的生活气氛，同样为了使身体康复，让灵魂更加坚定，年老体弱而又形单影只的作家在经历大手术后不久即决定去离巴黎 140 公里的比尤西安奥特的圣母庇护东正教修道院。他（Ильин, Шмелёв 2000b:186）在 1947 年 9 月 25 日给伊里英的信中写道：“我不能在这里（即在巴黎——笔者）走完‘道路’，需要宁静……我在这里找不到。应该离开这里，应该走进教堂，去修道院，小说中接下来的是一切”。1950 年 6 月 24 日，什梅廖夫动身上路。但在到达修道院的当晚，作家由于心脏病突发而溘然长逝。尤·阿·库特丽娜和修道院费多西亚嬷嬷是这样解释作家的身殒的：“上帝把伊万·谢尔盖耶维奇·什梅廖夫提前召唤去了，因为……上帝认为他的著作已经完成”。（Шмелёв 1998b:475）“……这个人来到圣母的脚下，在她的庇护下死去。”（Шмелёв 1968:375）

什梅廖夫的生命和创作道路就这样按天意结束了。这位伟大作家的作品今天重又回到俄罗斯，走进新一代的读者中，被扯断的时代之线重又被接了起来。什梅廖夫的作品蕴涵了宝贵的思想，那里有苦难的靈魂的全部情感和精神财富，有对人的最复杂的生活的不断探索的美学思想。他曾经苦苦思索存在的意义、思索祖国的命运。《天国之路》是作家寻找精神重生的尝试。什梅廖夫凭直觉感到这条道路有多么的艰辛。但他认为探索这条道路是自己的职责，他想告诉读者和自己：探索者一定能走完自己的路。

附注

1 以下作品引文只标出页码。

参考文献

- [1]Алексеев А. 1998 Проблема духовного реализма в рус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19 века [М], 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 [2]Бердяев Н. 1994 Философия свободного духа. [М], М.
- [3]Борисова Л., Дзыга Я. 2000 Продолжение «золотого века»: «Пути небесные» И. С. Шмелева и традиции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а [М], Симферополь.
- [4]Дунаев М. 1999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часть 5 [М], М.
- [5]Ильин И., Шмелёв И. 2000a Переписка двух Иванов т.2 [С], М.
- [6]Ильин И., Шмелёв И. 2000b Переписка двух Иванов т.3 [С], М.
- [7]Памяти Ивана Сергеевича Шмелёва 1956 [А], Мюнхен.
- [7]Сорокина О. 2000 Москвиана: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Ивана Шмелева [М], М.
- [8]Флоровский Г. 1991 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М], Вильнюс.
- [9]Черников А. 1995 Проза И. С. Шмелева: Концепция мира и человека [М], Калуга.
- [10]Шмелев И. 1968 Свет вечный. Париж.
- [11]Шмелев И. 1998a Собр. Соч. т.5 М.
- [12]Шмелев И. 1998b Собр. Соч. т.7 М.

The Way Below the Moon and “the Way To Heaven”

Dai Zhuo-me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distinguished writer Ivan Sergeevich Shmelev(1873-1950)was among the first wave of emigrants from Russia. In 1931 he was nominated for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The novel “the Way To Heaven” was written by Shmelev and published posthumously, which was described by the author as an experimental religious novel. This novel describes the search for an ideal spiritual rise to Heaven for the main hero and heroine. The unique creative style of the author constitutes a special method of artistic and religious realism. This spiritual realism represents the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In his pursuit of absolute spirituality, the religious discoveries of a mortal life of believers as well as the prime factor of the author’s homeland destiny — all reflect the existence of Jesus Christ in this world. This novel can be seen as an attempt to re-discover the author’s spirituality.

key words: religious novel; religious realism; contingency; autobiography; everlasting female

收稿日期: 2004-05-0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宗教神话主题”（02JAZJD740013）

作者简介：戴卓萌（1963—），女，上海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责任编辑：刘 银]

※ ※ ※ ※ ※ ※ ※

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古典文学人文精神的传承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和俄语学院拟于2004年9月召开全国俄罗斯文学学术研讨会。会议议题为：1) 19世纪俄罗斯古典文学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等几大传统在20世纪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20—30年代文学、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回归文学及解体后文学中的延续、发展、变异或消解；2) 纪念肖洛霍夫诞辰一百周年的学术研究。

研讨会希望与会者破除以往的权威话语和“公论”的束缚，一切从文学本体的成就出发，站在今天的文化高度，借鉴有成效的新文学批评方法，在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中对上述议题作出有新意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阐发。

会议时间：2004年9月14日—16日 **会议地点：**黑龙江大学
联系人：白文昌 叶其松 **联系电话：**0451—86609253
邮 编：150080 **0451—86608272**
通讯地址：黑龙江大学125信箱 **电子邮箱：**20010919yqs@163.com